

张杨，走在电影的朝圣路上

他去哪儿了?他怎么了?这是记者见到导演张杨后最想知道的问题。上次见他,是2012年电影《飞越老人院》上映时,他穿着衬衫和牛仔裤,脑门上盖着颇有造型感的斜分刘海儿。再次见面,是这个夏天,披肩发、络腮胡、登山鞋,即使在室内,他也戴着一顶皮质牛仔帽。

“不准备剪剪头发,刮刮胡子?”记者问道。

“不剪了,习惯了。”他说。

5年间,中国电影的银幕数、票房数成倍增长,跨界、玩票型导演层出不穷,市场空前繁荣,张杨却消失了——《飞越老人院》后,他没有一部电影上映。等到再度归来,人们看到的是两部讲述西藏故事的文艺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电影是部纪录片式的剧情片,讲述一群住在西藏东南县城芒康的藏民一路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故事,今年6月上映,引发热议;《皮绳上的魂》则是一部现实魔幻题材电影,展现了一位猎人的赎罪之旅,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多个提名。

“这5年,你去哪儿了?”

张杨回答:“沉淀自己,寻找自己,回到初心。”

中国式的公路电影

寻找自己,也是张杨新片《皮绳上的魂》的主题之一。在《冈仁波齐》大获成功之后,这部在同一年拍摄的,同样讲述西藏故事的电影备受期待。

《皮绳上的魂》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两部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讲述了一个因杀生而背负罪孽的猎人塔贝,被活佛点拨后,踏上护送圣物进入圣地——莲花生大师掌纹地的故事。电影有3条故事线时空交错,第一条是塔贝与少女琼一路降伏心魔,翻山越岭,寻找掌纹地;第二条是塔贝家族的世仇,一对兄弟寻找塔贝复仇;第三条则是一个作家,在西藏各地寻找塔贝路过的痕迹,思考小说该如何结尾。电影通过这3个故事,3队人马的旅程,将西藏的自然、人文景观展现在观众面前。张杨说:“这其实是中国式的公路电影,用一种‘在路上’的形式贯穿全片。”

片中有两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个是塔贝迷失在荒漠中,被一个藏戏班子救起,班子管事让他陪一位即将去世的老人看戏。塔贝抚摸着老人的手,两人坐在屋檐下,戏班围着篝火念起词:

满月即将升起,降临人间的孩子,请让我靠近,请让我伸出温柔的手,欢迎你。在仇恨的土地上长出仁爱的花朵,变成宽恕的微笑。让我理解别人,而不求被人理解;让我爱别人,而不求被人爱……

听着唱词,坐在神湖边的塔贝嚎啕大哭。“那是他得到救赎的时刻,是他理解生死的时候。”

另一个场景是结尾,塔贝在与兄弟俩的格斗中受伤,即将死去。作家赶来扶起塔贝,说:“我终于找到你了。”这是张杨设置的双关语:“塔贝其实是作家笔下的一个人物,也是他自身的投影,作家在时空错乱中找到塔贝,就是找到了自己,这是对主题的升华:作家找到了自我,解答了生命的焦虑;也是我自身的投影,阐释了我为什么要在西藏待上一年,这么辛苦地拍摄和寻找。根本目的还是想找到自我,找到创作的本心。”

两方面妥协,结果什么都不是

2008年后,中国电影开始大跃进,漫天飞舞的话题都是票房、明星、商业植入,导演行不行的标准变成了“他能



不能破亿”。张杨说:“这些东西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有时也想用一部电影证明一下自己,票房过个亿啥的。”于是,就有了百分百的商业片《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从故事设置上就颇为商业:一场车祸将3个失意男人联系在一起,之后又牵出他们和另外4个女人的故事。一群当红明星演着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放在如今也是个大卖的配方。张杨没想到,这样一部看似简单的电影,做起来竟那么痛苦。

“比如植入,那几年商业植入成了降低投资风险的必经之路,但为了植入广告,在剧本和拍摄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合情合理地把产品弄进去,必然会牺牲掉一些东西,对电影影响很大。”电影临开拍了,演员又出了问题,有的临时变卦,有的突然生病,有的对排名有意见退出,张杨只能到处打电话求助,摸爬滚打地拍完电影。整个拍摄中,他一直处在崩溃状态,根本没办法全身心投入创作。

“电影最终票房2000万,和预期相差甚远。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触及观众内心,只有浮于表面的结构和故事,但精神表达是缺失的。”和电影名字一样,那时张杨的内心,也成了“无人驾驶”。

一年多后,张杨开始了又一部电影——《飞越老人院》。原先剧本的设定是几位老人为完成一个去世的伙伴看海的遗愿,抱着他的骨灰盒跑出老人院的故事。张杨希望电影中能有些黑色幽默、荒诞的元素。可碰上了投资方,一切都变了。要用七八十岁的不知名演员,不行,没有大牌电影都卖不出去;要做黑色幽默,不行,没有感人、煽情的东西电影也卖不出去。最后甚至出现换导演的声音,张杨只能改剧本。

“改来改去就是把原本比较荒诞的人设改成了中规中矩的,回到探讨家庭伦理、父子关系,老年人社会问题的套路上,还加入了一些鸡汤式的对

白。”原本很酷的电影,变成了催泪片。

“电影上映后,口碑也挺好,很多观众被感动了,但我自己特清楚,我要的那种感觉不是这样的。上映时我还要面对媒体不断去说那些故事多感人,说我自己多么爱这片,其实心里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飞越老人院》之后,张杨搬去了云南大理,在那儿开了一家客栈,每天种种花,逛逛街,然后就是思考。“关于电影,我怕自己知道得越多,就忘记得越多,远离是为了沉淀。我要摒弃那些轻车熟路的技巧,让自己回到最初,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去寻找。”

于是,去西藏拍电影的计划出现在了张杨脑中,那是他多年的梦想,也是他认为自我解放最好的方式。

用苦行僧的方式拍电影

张杨第一次去西藏,在1991年。那时的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暑假有3个月空闲,就拿着父母给的3000块钱,带上一个随身听、十几盘磁带和两本书,一路向西。那是一次随性的旅行,坐长途车,搭顺风车、住青年旅馆,听着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重金属,孤独而自在。

二十出头的张杨对拉萨有两个深刻印象:一是要饭的多,二是野狗多。藏族人信佛,都会放些食物在门口,拉萨的野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住在一位叫德钦卓嘎的老太太家。老人70多岁,常常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她原本是贵族小姐,家庭成分不好,1958年时丈夫又跑到印度,留她一人,之后遇上“文革”,更是雪上加霜。老人一生命途多舛,张杨心想,这是多好的电影素材。那次旅行让他决定未来一定要到西藏拍电影。

2006年,张杨看了许多扎西达娃的小说,对其中几篇很感兴趣,于是就找到扎西达娃,请他给自己写剧本,这

就是《皮绳上的魂》的由来。后来,一个朋友给张杨看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一帮青海藏族人,在羊年去梅里雪山转山。看完后,张杨说:“我会拍一个真正的磕着长头朝圣的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冈仁波齐》。《冈仁波齐》与《皮绳上的魂》都拍摄于2014年,“这种电影在商业上很难有作为,一旦一部拍完了卖不好,下一部找钱就更难了。两部一起拍完,我才能踏实”。

《冈仁波齐》先于《皮绳上的魂》拍摄,一是这片主要是纪录片手法,团队小,能提前磨合,为之后的拍摄做准备;二是《冈仁波齐》一路从芒康走到拉萨,可以趁机为《皮绳上的魂》找景。

片中有一个情节,是朝圣队里孕妇生产,孩子一落地就被带上车一同朝圣,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朝圣者在路上的时间,短则五六个月,长则一两年,甚至有人十几年都在路上,有的会把家里的房子、牛羊都卖掉,一家人去,不管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们认为在路上出生和死亡都是很正常的,而孩子在朝圣路上出生,是功德无量。”

从芒康到拉萨,风霜雨雪都遇上了,张杨还因体内钾流失过多得了高原病,进了医院。但这段苦旅让张杨体验到了电影拍摄的另一种方式。“很多场景没有旅馆,就自己搭帐篷,天当房,地当床。我们的扎营地都靠近水源,风景很美,晚上看着浩瀚银河,斗大的星星似乎唾手可得,真是感叹造物的神奇,而渺小的自己能见识到这样的神奇,多么幸运。”劈柴生火,油茶肉干,那是他人生中最慢也最惬意的拍摄时光。

“我想,自己这一路的拍摄,不也是一种修行吗?在电影的道路,我也是信徒。我知道作品不可能完美,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能永远努力接近完美。”张杨说,“但其实只要是在朝圣的路上,心里便已是极为幸福的了。”(来源:环球人物)